



# 知青文学:精神放逐的反思

## ——海南周刊对话著名知青作家郭小东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梁昆



郭小东:

国家一级作家、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、教授、硕士生导师。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学院院长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、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副会长、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、广东现代作家研究会会长、广州国际中华文化学术交流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。1992 年被授予“广东省优秀中青年专家”称号、1994 年被授予“广东省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家”称号、首届“广州市十大杰出青年”。

### 知青文学的三个时段

海南周刊: 尊敬的郭小东先生,您是知青文学的实践者,又是知青文学理论的建构者,知青作家和知青文学是中国社会特定时期所产生的,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历史的一部分。那么,对知青文学,当以何种眼光做整体的概观?从研究者角度看,知青文学有几个阶段?

郭小东: 知青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部分。其重要性不仅因其在新时期文学中的数量与质量,更因其最能显示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,继承与反叛 20 世纪中国文学传统,以及对主流文学的认同与检讨。知青文学有当代中国曾经被忽略的人文精神、社会革命和市民世俗思想的主题视野,知青作家更现实、也更深入地体恤中国自 1950 年代以来的社会苦难,并对之作真切的文学表达。这是“重写文学史”一个不可忽略的基本内容与重要话题。

“知青时期文学”、“知青记忆文学”及“知青后文学”——这是三个知青文学时段。它们之间的联系、差异和对抗,既是时态意义的,更是社会政治和现实变革乃至思想转变包括文学观念逆转诸方面的。

流放和流放者的文学,对放流的独特的文学追述,流放者的感悟,精神放逐的自我批判与反思,既是中国殊异的社会革命方式所诱导鼓励的产物,又是革命时期的文学证词。理想与憧憬的革命化与对之的反叛,构成知青文学三个时段的文学状态,并成为中国革命文学的最后一面旗帜。

海南周刊:从文艺美学上来看,知青文学的地位怎样?

郭小东:知青岁月,已经成为一种畸形的精神资源,孕育着不同年代的知青文学。

20 世纪 60、70 年代,80 年代,90 年代,21 世纪,这四个年代构成三个时段的知青文学。它们因其时代因素和作家构成的不同,文学状态和性质也相应略有差异。

但是,从总体上言,知青文学,在深秋的的中年的人生里,我们仍然读不到超然的悲悯;在惆怅的日落时分,仍然无缘领受一份穿透历史真相的深邃目光;在追忆中,那种刮骨疗伤的忏悔,仍然

迟迟不来。

### 40 年知青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

海南周刊:知青文学在 40 年文学大潮中占据怎样的地位呢?

郭小东:一切结论都必须到历史状况中去寻找。40 年来的知青文学,不管其最终的文学成就如何,在每个文学时段上,它都充当了主角。知青时期文学(“文革”10 年期间),知青长篇小说有 15 部之多(《征途》、《分界线》、《铁旋风》、《山风》、《剑河浪》和《青春》等等),占当时长篇小说产量的一半以上,形成当时长篇小说创作的主流。它以背离现实、虚张声势以及乌托邦纪事为主要特征,而这也正是那时的时代精神。虚拟与先验的文学元素装饰而成的故事、人物、情节与性格,至今读来仍令人忍俊不禁。它们的作者是知青中受宠于当时政治的圣人。

1980 年代的知青文学是一种集体记忆的历史书写。

所谓记忆,是对曾经的生活现实消解与删除之后的结果,是一种体验的集体再现。在文学中,它以集体共名的角色表达群体的声音,以个体人物去展示和铺排史的效果。《伤痕》、《今夜有暴风雨》、《雪城》、《蹉跎岁月》、《本次列车终点》、《北极光》、《年轮》、《孽障》、《桑那高地

的太阳》、《被囚的普罗米修斯》、《当代骑士》乃至后来的《黑骏马》、《北方的河》、《南方的岸》、《大林莽》、《世界》和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等等,1980 年代知青文学饱浸着流放地的鲜血与污浊的腥气,以一种在此之前中国当代文学从未有过的精神挣扎和灵魂呻吟,铺天盖地地扑向每一个人的心头。与其说人们在倾听文学,不如说是在呼唤时代的变革。

由 1980 年代的社会环境和文学承担建设起来的知青文学的整体悲剧风格,在 1990 年代迅速式微。王蒙的逃避崇高,刘再复的告别革命,对集体话语和宏大主题从理论上提出质疑;还有王朔的粗鄙与韩少功的寻根,方方和池莉等新写实主义的文学实践,文学迅速趋向多元。知青作家纷纷转向,张承志以笔为旗的宣言成了风中绝唱;梁晓声、史铁生的退守却顺应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势。他们或告别热情与悲壮,或以平和心态叙写人生秋天的丰饶和宽厚,前者是梁晓声的系列作品《九三漫忆》、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》等;后者是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、《命若琴弦》和《务虚笔记》等。

知青记忆书写的式微,也就是知青文学悲剧的式微。

1980 年代的知青作家在 1990 年代的集体溃败,预示着新的文学形势的诞生。

在这种旷日持久的式微中,有一种现象却始终不衰,那就是遍地开花的各种知青回忆实录,这些出版物的数量几倍于正式出版的知青小说。它们作为一种压抑已久的民间声音,其状况更为复杂,是新时期知青文学的另一种立场、姿态和声音。

### 海南曾是广东当代文学的重镇

海南周刊: 知青文学从社会转型初期的产物,到后期形成反思色彩浓厚的文学形式,他们的精神姿态和写作姿态应作怎样的认识?

郭小东:时至今日,知青文学在自身发展的 40 年间,已经提供

了足够的文学资讯。可以说,从李剑的《醉卧花丛》起始至今这 20 年间,在主流知青文学之外还有一条绵延不断的虚线,即李剑《醉卧花丛》、阿城《棋王》、刘醒龙《大树还小》、李洱《鬼子进村》和何顿《眺望人生》、王小波《黄金时代》、池莉《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》等。这些作品以一种反叛主流的另类叙述,呈现 1980 年代、1990 年代至今知青文学的非主流倾向。这是对主流知青文学的惯常手势——成功者说的叙述特征的无情奚落,也是对青春无悔的全面颠覆。它们完全抛弃主流知青作家的文学观念、文本方式和写作手法,而以非知青视角的异度审视,边缘立场的重新确立,反讽的文学态度,以及对以往知青文学传统的坚决割裂与蔑视,向庸常和常识靠拢,以破碎的生存境遇和低俗的欲望观念,去对抗以往知青文学中常见的弊端——对“我”的消解,而以“大我”的共性经验去编织故事,以达到史的证明和结论的企图,从而把个体的人、独特方式的“人”字高悬于俗世之上。这是文学中人本主义精神的异度张扬。

海南周刊:在知青文学史上,海南是一个被遗忘的地方,曾经活跃着当时最优秀的知青作家,后来还成了一个作家包括知青作家的集结地,海南的知青文学是否应该得到高度评价,同时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?

郭小东:其实,广东当代文学的重镇曾经是海南而不是广东本土。海南作为那个时代广东的“流放地”,曾于 1950、1960、1970、1980 年代,产生大量后来成为广东文学史上重要成就的作家作品。

### 海南是南方知青文学的圣地

海南周刊:如果笼统地概括知青运动,概括知青文学,这都容易造成一种平面化的理解,应该怎样跳出平面化,来看待海南知青文学的丰富性呢?

郭小东:海南,可以说是南方知青文学的圣地!一直想谈谈海南的知青文学,可始终找不到适合的时机,海南是一个被遗忘的地方。尽管她曾经是全国最大的知青上山下乡地区之一,曾经活跃着当时最优秀的知青作家,诸如广东的孔捷生、洪三泰,伊始、吕雷、郭玉山等等,后来还成了一个作家包括知青作家的集结地,如韩少功、晓剑、蒋子丹、陈剑晖和张新奇等,但是,海南的知青文学真的被遗忘,被文学史所忽略了。没有任何理由就是最大的理由。多年来,文革与知青总是一对敏感的的话题,尽管所有的中国人,都无法绕过这两个话题。所有的现实,包括时下在大张旗鼓地纪念与张扬的改革开放 30 周年这个重大事实,都与文革与知青记忆相关。没有极左的文革浩劫和知青运动,何来改革开放 30 年的重大意义?没有闭关锁国的文革与文革前的岁月,又何来改革开放

30 年的重大发展?

海南周刊: 如果从地域特征来看,海南知青文学的这个空间的分布活跃度是否很高?在文学史中可以是有占有恒久的意义吗?

郭小东:今年是知青运动 40 周年纪念。五年小庆,十年大庆,这似乎已成传统。40 年前,12 月 22 日,毛泽东发出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……”的伟大号召,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,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,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,是“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伟大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”经后来公布的统计数字,最保守的估计,当时有 1700 万的初、高中毕业生,响应毛主席号召,到农村边疆去上山下乡。十年后的 1979 年,这 1700 万人以“大逃亡”的方式,陆陆续续返回城市,引发了城市与乡村的又一轮大震荡。



郭小东作品封面。(资料图片)

海南的知青文学应该得到高度评价,同时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。洪三泰的诗《寄自黎母山》,张粤来的《红土歌》和冯麟煌的诗。孔捷生的《在小河那边》、《南方的岸》和《大林莽》等小说,包括海南建省之时进岛的老牌知青作家韩少功的《西望茅草地》、晓剑的《世界》等一系列知青小说,都应该成为海南知青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海南的文学史家们,对海南知青文学缺失一种切近的敏锐近乎麻木。目前广东本土有出息的作家,几乎皆出于海南。就其作品而言,诸如:电影《椰林曲》、《南国风云》、《碧海丹心》、《红色娘子军》、《特殊任务》、《西沙儿女》、《海外赤子》。诗歌、散文、长篇小说,更不胜数。还有一些牵涉全国的重大文学事件,也发生或与海南有关,这些都被忽略了。将海南文学史目光,仅停留在建省之后,实在是狭隘。

海南的知青文学走势,其实是与中国的知青文学同出一脉且同步前行的。看不到这一点,正是一种自我遗忘的病症。



知青们在劳动之余自娱自乐。(资料图片)